

中國李白研究

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

每期是

期

2013年集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中華書局影印
李本寧研究

中華書局



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

卷九题跋

中国李白研究

2013年集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李白研究. 2013 / 中国李白研究会主编. —合肥:黄山书社, 2013. 12

ISBN 978—7—5461—4036—0

I. ①中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李白(701~762)—人物研究②李白(701~762)—唐诗—诗歌研究 IV. ①K825. 6—53②I207. 227. 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6624 号

中国李白研究(2013)

出版人 任耕耘

责任编辑 石松

装帧设计 陈强 石晓

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
官方直营书店(<http://www.hsbook.taobao.com>)

营销部电话: 0551—63533762 63533768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 23007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制 合肥市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4.5 字数 400 千

版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978—7—5461—4036—0 定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电话: 0551—64235059

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暨国际李白学术研讨会
纪念裴斐先生八十周年诞辰暨《裴斐文集》发行仪式

2003.10.19



目 录

纪念裴斐先生八十周年诞辰专栏(12篇)

裴斐先生的“逸情”	薛天纬(1)
一位“方”的学者	
——纪念裴斐先生	徐公持(5)
裴斐先生印象	阎 琦(10)
裴斐先生的治学之道	葛景春(15)
跟我们走得越来越近的学者	
——在《裴斐文集》发行仪式上的讲话	詹福瑞(18)
在《裴斐文集》发行仪式上的讲话	杨庆存(21)
在《裴斐文集》首发仪式上的讲话	管士光(24)
纪念裴斐先生	刘跃进(27)
裴斐先生对李白研究的特殊贡献	蒋 志(29)
对此可以酣高楼	
——在《裴斐文集》发行仪式上的发言	朱易安(41)
追寻中国文学的自由传统	
——裴斐先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	蓝 旭(45)
试论裴斐先生的“李杜优劣论”及其对	
古典文学研究的启示意义	胡永杰(59)

关于李白《草堂集》的编辑及其“古风”命名的断想	阎 琦(69)
关于《古风五十九首》研究的三个问题	薛天纬(85)
李白诗在唐五代的编集与流传	王永波(94)
李杜赋合论	钱志熙(107)
李白古乐府学内涵探析	吴相洲(125)
《太白何苍苍》系年与李白相关行迹求是	阮堂明(135)
《望庐山五老峰》系年新考论	吕华明 刘丹(149)
李白《三五七言诗》的著作权问题	李德辉(163)
李白诗“流霞”考	
——兼论汉唐“流霞”义衍变	卢燕新(168)
李白再次入越之缘由及贺知章之影响	吕玉华 蒋凡(176)
关于李白由南陵奉诏入京问题的补说	汤华泉(189)
李白干谒考	郭相宜(195)
李白笔下的山东物产	朱 宁(215)
元人萧士贊注释李白诗的动机与指导思想	张 佩(221)
李白大赋中的西域元素考察	
——以王琦注《李太白全集》为中心	朱秋德(234)
苏颋谈李白文章之风力与学	李清渊(242)
李白诗歌的高度	康怀远(244)
盛唐李白之生命美学解读	刘伟(255)
李白游仙诗简论	
——兼议对《楚辞》游仙体式的接受	李莹 李金坤(267)
论李白诗歌的“反常合道”	李 明(278)
杜甫在秦州的李白情结	葛景春(289)
试论李白《秋浦歌》与王维《辋川集》的异同	吴振华(300)
李白接受史的重构	
——读李守章的《李白研究》	朱易安(319)

略述“力士脱靴”故事的传播与接受	崔际银(333)
论“金士巨擘”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	潘殊闲(343)
民国时期李白评传说略	任晓勇(352)
艾龙选译《李白诗集》初探	海 滨(362)
英国汉学家阿瑟·韦利的李白研究	蒋文燕(373)
抵制网络恶搞,树立诗仙形象	李 云(399)
李白资料汇编补遗	张瑞君(404)
李白研究又出力作	
——评张瑞君先生《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新探》	
	万德敬(409)
巨幅山水画卷 欢快送别心曲	
——谈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	张家琪(414)
2011~2012年国内李白研究综述	孟祥光(419)
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综述	李德辉(437)
附 录	
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	
研讨会开幕词	薛天纬(452)
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闭幕式的发言	朱易安(454)
中国李白研究会换届选举公报	(457)

[编者按]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除了学术讨论外,还举办了《裴斐文集》发行仪式暨纪念活动。本期特辟专栏刊载纪念活动上部分学者的发言稿及相关研究论文。

裴斐先生的“逸情”

薛天纬

16 年前,裴斐先生辞世时,中国李白研究会秘书长李子龙嘱我代表研究会撰一副挽联。回想当时,痛悼之情撞击于胸,对裴斐先生的印象又特别深刻,两句联语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从心底涌出:“得太白三分傲骨三分逸情三分才气,留世间一品风标一品人望一品文章。”今天纪念裴斐先生 80 诞辰,这副对联再现于会场的屏幕上,我似乎才回过神来,意识到傲骨、逸情、才气、风标、人望、文章这六个词,其中四个是说着裴斐先生之“人”,只有才气、文章两个词说他的“文”;而且,我是下意识地把裴斐先生与李白做比。我把裴斐先生与李白相比拟,并不在于他是研究李白的专家,而在于他与李白一样,不仅以其文章、更以其人格魅力影响当时及后世。我们崇拜李白,因为他是“诗仙”,更因为他有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独立人格。同样的,我们崇敬裴斐,因为他文章做得好,更因为他具有与李白类似的人格精神。裴斐先生的人格,体现于“傲骨”与“逸情”。关于“傲骨”,也就是他力主的作家人品的“方”,大家感受最深,说得也多,不“方”,他当年不可能成“右派”;这里,我想就个人感受说说他的“逸情”。

“逸情”谓何,似难于言传。想来想去,模糊地说,似指裴斐先

生类似魏晋文人的那种气质风度，那种通脱、放达的行事做派。裴斐先生从来不拿身份，不拘礼数，甚至不拘行迹。上世纪的 1955、56 年，当裴斐先生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并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整版地发表文章时，我还在读初中，因此，论辈分、年资与学问，裴先生无疑是我的师长。在我心目中，也始终将他奉为师长。然而，80 年代初相见伊始，裴先生就把我和我的同学如阎琦等视为朋辈，言谈笑语，推心置腹，略无间隔。他住在北大蔚秀园，那些年我每到北京，必去拜访。他见到我们总是十分高兴，不但热情叙谈，而且往往留饭。吃饭少不了炖一只鸡，还少不了饮酒。饮到兴头起来，话语也就更加随意。裴先生常给我们讲北大旧事，也会说到学术界的一些事情以及他的看法，议论时事，月旦人物，没有顾忌也没有保留。我有不少裴先生的赠书，扉页题写赠语，早先称我“同志”，后来就迳称我“老友”，这使我不免惶恐，但更多的还是感动，私心很受用。

裴斐先生行事超脱世俗，不计功利，不屑于人情世故。四川江油的李白研究活动，起步事实上在马鞍山之先，组织学术会议、成立学术团体也早于马鞍山。但马鞍山一旦起步，却更具有全国性、甚至国际性眼光。江油较早成立了“四川省李白研究会”，裴斐先生是“蜀人”，自然是其中的核心人物。等到 1987 年马鞍山筹备成立“中国李白研究会”时，江油方面似乎才醒过来，于是与马鞍山展开了“中心”之争。裴斐先生明确地站在马鞍山一方，并且利用他在北京的有利条件，为“中国李白研究会”的成立做了不少具体贡献。裴斐先生并非不顾念乡情，他的“故乡情结”事实上很浓重，两个儿子一名裴蜀，一名裴益，就是明证。他力主李白出生于蜀的观点，尽管这一观点有其学术依据，但在旁观者看来，仍不免“故乡情结”的影响。但在李白研究的“中心”之争这件事上，裴斐先生却不顾世俗乡情，很有“大局观念”。

说到学术观点，裴斐先生也有他非常任情的一面。关于李白诗中“盛唐气象”的争论就不必说了，另一个例子，是李白“两入长安”问题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关于李白“两入长安”的研究是最热门

的话题，并且得到了长足进展，大多数研究者都赞同这一突破性新说。裴斐先生却不以为然，他曾不无戏谑地说：“问你来过几次北京，你能记清楚吗？”裴斐先生并非不重视他人的考证成果，但他更注重自己出于性情的主观感受，这也正是他的李白研究的独到之处。裴斐先生很雄辩，讲话斩钉截铁，纵横捭阖，极有感染力，你即使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，但你肯定会折服于他，并且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

裴斐先生很重友情，这一点也与李白的“存交重义”有相通之处。李子龙患上“慢粒性”白血病时，裴斐先生在北京发起中国李白研究会同人为他捐助，裴先生自己当然捐得最多。我当时正好出差在京，给子龙的捐款就是在北京寄出的。子龙那次能战胜病魔，裴斐先生及众多友人的精神支持肯定起了一定作用。

裴斐先生也像魏晋名士一样，平日不修边幅。印象中，他经常穿蓝色中山装，看起来有些“垮”，好象也穿过刚刚兴起的西服，也是蓝色，但似乎没见他打过领带。他陪我们在北大校园里走，出门不换衣服，还是在家里穿的那件咖啡色的开襟毛衣。衣着尽管不讲究，但裴先生的气度自有夺人之处。

裴斐先生有本论文集《看不透的人生》，但他事实上把人生看得很透。不但看透了人生，而且看透了生死，所以，他才能毫无忌讳地在课堂上讲自己正在加快奔向“火葬场”。谁知他竟不幸而言中了。裴先生手术后，住在安贞医院。我到北京后，与正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朱玉麒去探视，记得是晚上，病榻上的裴先生，因为做治疗，剃去了原先雄狮一样的头发。一见面，他就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天纬，我病了！”我很悲伤，但还是违心地说着宽慰的话。96年秋，裴先生住在西北郊一处疗养院，我们又去看他，那天天气晴朗，裴先生精神也很好，谈笑风生，似乎把疾病完全置于了身外。他为“世界文学名著文库”所做的《李白选集》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他手赠我一册精装本，在扉页上题写赠语后，郑重地盖了名章，又小心地衬了一张纸巾，这成了裴斐先生留给我最珍贵的纪念。

1998年春，中央民族大学要编辑出版裴斐先生辞世一周年纪念文集，先生高足蓝旭负责编辑工作，写信告诉我，收到的纪念文章多为回忆裴先生生平事迹，而缺少较全面地综述其学术研究的文章，希望我能专写一篇这样的文字。接着，蓝旭给我寄来了裴斐先生1955、1956年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连续发表的大块文章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系统地重温了裴斐先生旧作，也更加深了对他的敬重与怀念。这次出版《裴斐文集》，蓝旭又把我当年写的那篇《立马文场 凛有威》作为附录编了进去，这使我十分感激。我在纪念大会的即席发言中说：“即使我所写的其他文章都不免速朽，这篇文章却一定能借着裴斐先生的文集而流传不朽！”这是我发自真心的感激。

(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)

一位“方”的学者

——纪念裴斐先生

徐公持

裴斐先生是优秀的文学研究家。他的治学领域甚广，包括文学原理、中国文学史、唐代文学等，他在广阔的领域中，都取得了卓著成果，这难能可贵，受到同行的普遍推重。

我有幸结缘裴斐先生，在1985年。当年我忝任《文学遗产》杂志主编，在新成立的编委中，赫然有裴斐大名。在编委会上，我与裴先生初次谋面。当时第一眼印象颇深，他个子不高，瘦削的身板，清癯的面容；年龄不算大（当时在编委中他是比较年轻的），但一脸沧桑；他长着竖起的头发，又蓄有一撇浓浓的胡子，以致有一位年轻编辑悄悄对我说：“那不是鲁迅来参加咱们编委会了？”我一听，真有同感，他真的有些像鲁老夫子。

裴斐先生作为编委，很认真负责。一般“编委”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其实挂名的居多，干实事的少。我也挂名过若干编委，自愧真没干多少实事。裴先生既挂名，也做事，可谓“名副其实”。每当编辑部有事找他，他从不推诿，一定热情答应，并且认真去做。尤其是请他审稿，他做得十分认真，所提意见，简练而深刻，不讲情面，一针见血。他每次参加编委会，都事先按照会议通知要求，认真做准备，并且写有简单的发言提纲。他思考问题很全面，也很具体，有按照学科发展形势需要调整刊物方向的问题，倡导质朴平易言之有物的学风问题，也有编辑制度建设问题，甚至还包括刊物的发

行问题,等等。记得他曾对当时的一种学风有所批评,他认为有些文章,只是从西方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中截取一些流行名词,用来套中国文学和文学史,文章写得空洞无物,又晦涩难懂,叫人看起来很吃力,也不知作者要说明什么问题。他很反感这种文风,他认为这一方面是食洋不化的结果,同时也是作者学术能力不佳的表现,真正有水平的文章,不在于有多少新名词术语,而是应写得内容充实,提出自己的见解,并且解决问题;不要在名词术语上下功夫。他建议《文学遗产》应少登或不登那种华而不实的文章。我们编辑部的人听了,觉得他的意见很对,所以加强了对学风、文风的关注。他多次提出,要重视那些提出了独到见解的“有思想”文章,尤其是对青年人的文章,应当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,即使存在局部不足和缺点,即使论证得不那么全面周到,也可以网开一面。这些意见,我们编辑部都很重视。那些年《文学遗产》的经济状况很困难,因为作为专业刊物,肯定是亏损的,不可能做到经济自立;经费全部靠文学研究所拨给,而文学所本身就很拮据。记得裴先生给我们出主意,其中包括不发稿费一条。他甚至振振有词说:“我带头,我不拿稿费;我们编委不要稿费,行不行?”当然我们没有接受他的建议,坚持发稿费(很微薄)。但他的精神着实感动了我们。裴先生对编委工作的重视,还表现在他把“《文学遗产》编委”几个字,印在他的名片上。必须说明,在我当时所看到的编委名片中,很少这样做的。我当即将此事作为重要信息告知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,大家都感叹:“裴先生真把《文学遗产》当回事!”也为此,今天这个纪念会,我是非来不可的。裴斐先生当年把《文学遗产》当回事,我今天岂能不把这个纪念会当回事?所以我感谢陈允锋教授给我发来邀请,没有错失这样一个向裴斐先生表示敬意的机会。

裴斐先生做学问,成绩斐然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,他思想深邃,秉持独立的学术精神,从不随波逐流,提出许多启人心智的精湛见解。例如关于“形象思维”问题,他的见解就很独到。他根本

上反对所谓“形象思维”这一说法。他认为，形象思维论在世界文论中没有什么影响，但在中国却特别走运，似乎已为理论界普遍接受，而其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，它都无法成立。他论证说：“人的思维是以概念（词）为基础的，而概念便是对事物属性的抽象，所以思维只能是抽象的。”“主张形象化，这自然是对的；意思是说作家思想感情要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表达；主张形象思维则不对，因为形象本身是无法用来思维的。”“有人把所谓形象思维吹得神乎其神，说是作家的思维始终离不开形象，一旦离开就成了概念化（或曰抽象思维）。”“始终离不开具体形象，不能进行抽象，这种情况有没有呢？有的，但它不存在于人类，只存在于动物界。动物对世界的感知便始终离不开具体形象，因此也就没有思维。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就是从对事物进行抽象获得概念开始的。概念是人类理性的开始，反概念的实质是反理性。”（以上引文皆见裴斐著《文学原理》第十二章“作家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吗？”）又例如他说：“凡是存在的，都是合理的——正确；凡是存在的，都是不合理的——也正确！”“有人说，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，这话不错，但还不确切。确切的说法应是：爱情的遗憾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。”“‘穷而后工’并不是一种理论主张，但比起主张‘言志’、‘载道’的儒家正统文论来，它更合乎文学发展规律，因而在理论上也更有价值。”等等，这些论断，都迸发着思想的火花，发人深省。

我要回到发言的题目上来：裴斐先生是一位“方”的学者。这里涉及裴斐先生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论点——“方圆论”。这是1987年的事。《文学遗产》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，会议题目是“中国古代文学史研讨会”。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大学和研究部门，约有一百五六十人，规模不小。在会上，裴斐先生做了发言，他的原意是要清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问题。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：古代文学家有方的，也有圆的。所谓“方的”，是指那些性格正直、行事作风棱角分明、甚至具有叛逆性格的“狂狷”式作家；“圆的”则指那些缺少道德操守，处世中庸圆滑的作家。

滑、善于机变、善于迎合权势以谋取私利的作家。他认为一些优秀的文学家，往往是“方的”，如屈原、司马迁、嵇康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苏轼、王安石、曹雪芹等等。“圆的”作家也可能取得成就，但不会成为第一流作者。他的这个说法，或者“命题”，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。他发言刚结束，就有不少人举手，要求上台即兴发言，要与裴先生讨论交流。我作为会议主持人，见状很为振奋，因为我很担心会议开得平淡无奇、不温不火、缺少波澜、缺乏高潮。有了这个现成的“交锋”话题，岂能轻易放过？于是会议立即转入了争论，对于裴先生的说法，有的反对，也有的赞成，还有的作修正，总之，一天会议就围绕裴斐先生的“方圆论”进行了，裴斐先生面对众多质疑者，多次到台上回应，舌战群儒，气场十足，以致晚餐时间到了，不少人还意犹未尽，还要上台接着发言。当年与裴先生交流或者争论的学者，多数是血气方刚的青年，如今大部分已是学科的一线学者，学术带头人，他们都可以证实我的记忆，并非虚构。这次以裴斐先生为主角的会议，其热烈的气氛，在我所参与过的学术会议上极少体验到。

裴斐先生的“方圆论”，作为具体的论点当然可以讨论。但是我在二十六年之后，在今天这个场合，要给裴先生的“方圆论”再做一个“注脚”，那就是：裴先生本人，应当属于“方的”学者一类。他完全符合他自己所提出的“重视道德操守”、“个性突出”的类型。他本来是一位北大高材生，然而因为 1957 年发表了一些“不合时宜”的言论，要筹办“同人刊物”，曾经被打入“另册”，逐出学府，发配去从事艰苦的体力劳作。二十年以后，他才重返教育科研工作岗位。他爆发出惊人的能量，在课堂上传道授业，同时发表诸多高质量的成果，为学术的拨乱反正和正面建设，作出令人瞩目的贡献，并且进一步展示了他的风骨和人格。

面对裴斐先生的风骨，我个人深感差距明显。就以“形象思维”问题而言，其实我自己从青年时代起，就一直对“形象思维”论持怀疑态度，因为我在大学里学过心理学（不是所谓“文艺心理

学”，而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普通心理学），那里讲的基本原理之一，就是人的思维是以抽象性为特点的，思维只有进入到抽象阶段，才能进入较高的层次，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。动物也能思维（这一点与裴斐先生所说不同），但动物不能（或者基本上不能）抽象，所以只能认识到事物的具象性状，而认识不到本质，它们只能做低层次思维。所谓“用形象思维”，那只能是动物的思维（一、二岁婴儿的思维也是）。但是我虽然持这样的观点，却始终没有站出来论证和发表。吴组缃先生在给裴斐的信中说：“说老实话，您的许多见解我也有，且因有自己的体会，颇为自得，但并无多少自信；又常常发觉多有偏颇，不时暗自改正与弥补。由此我益觉您的高明。”我在这里也要“说老实话”，我的状况，同样也是有一定见解而“并无多少自信”，所以一直没有也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。此外我还要说明一点，我所欠缺的，除了“自信”以外，还有与“成见”和“主流”观念作对抗的学术勇气。与裴斐先生相比，我只能自愧弗如了，并且“益觉”他的“高明”。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：自己能算是“方的”还是“圆的”学者呢？

裴斐先生则确定是“方的”。他这样的学者，正是我们今天社会人文学科建设所迫切需要的。我们今天其实不缺乏“精英人才”，也不缺乏“科研规划”，甚至也不缺乏“科研经费”，缺乏的只是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，是“方的”学术品格。我敬仰“方的”学者，并且认为这里正体现出一种中国优秀品格和传统。如果学界能够涌现更多裴斐先生这样的“方的”学者，那么中国的学术有幸，中国的文化有幸。

（本文据作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“纪念裴斐先生八十诞辰及《裴斐文集》首发仪式”上的发言整理而成）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）